

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

黃 福 慶

- 一、前言
- 二、生平簡介
- 三、滿鐵的發軔與後藤的佈署
- 四、「文裝的武備」的殖民理論
- 五、調查事業的倡導
 1. 滿鐵調查部
 2.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
 3. 東亞經濟調查局
- 六、結論

一、前 言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為日俄戰後日本在滿洲（為配合當時的情事本文一律用此地名，地區僅限南滿）成立的鐵路公司，在組織規程中其經營的事項僅為鐵路、炭礦、港灣等，事實上，該公司在成立之初，日本政府即賦予殖民滿洲的特殊任務，並計畫以此作為伸張勢力於中國大陸的據點。

因為經營滿鐵的成功與否關係著日本殖民政策的成敗，因此負責經營滿鐵的人選，即成為很重要的課題。後藤新平因有治臺的經驗，在日本元老及閣僚一致的屬意下，出任滿鐵的首任總裁。

無可否認，後藤是開創滿鐵的大功臣，他擔任滿鐵總裁雖不滿兩年（一九〇六、十一～一九〇八、七），但他在這短短的期間內，不僅建立了滿鐵的架構，同時其日後龐大的規模及各調查機關獨特的性格等，都是在他的籌劃下奠定基礎的。

滿鐵可以說是日本戰勝後的副產物，也是在複雜的國際情勢下創設的。戰後的

日本，對俄國的復仇始終不敢掉以輕心，所以滿鐵在滿洲的措施，除要因應俄國的威脅外，一方面也要顧及其他列強的環伺，更重要的還要與當地人民及中國政府取得溝通。滿鐵畢竟是設立在中国的領土內，如果得不到當地人民的合作及中國政府的默許，是很難推展各種措施的。後藤出身醫學界，受過自然科學的洗禮，他深知在這弱肉強食的時代，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能支配人類的道理，他基於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時推展殖民政策的經驗，認為文治應優於軍治，惟有如此，才能使殖民地的人民信賴日本，皈依日本，達到殖民的目的。出任滿鐵總裁前後，他提出不少有關殖民的理論，而其中心思想就是「文裝的武備」。綜觀後藤在滿洲的一切措施，可以說都是以這一個理論為出發點。本文主要在探討後藤的「文裝的武備」的理論基礎及其所採行的有關措施。

二、生平簡介

後藤新平（一八五七～一九二九）是明治末期與大正時期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雖然出身醫學界，但他在七十三年多的歲月中，除四十二歲以前擔任其本行——醫師及衛生行政的工作外，以後歷任臺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改為民政長官）、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長等要職。他的後半生雖然幾乎位居政府要津，卻沒有成為正規的政黨人物，始終致力於謀求政治的獨立。後人對後藤的讚揚，並不是稱道他有顯赫的政績，而是推崇他凡事都以科學的方法加以處理^①。

美國的歷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 A. Beard 1874-1948）曾讚揚後藤為世界上的一位傑出的科學政治家^②，以他的出身背景而言，比爾德的頌詞的確很恰當，因為他出身醫學界，曾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因此他在處理事務時，無不以科學的方法作為前提。他力主「學俗並進」，認為所謂文明的生活，是要將學者與俗人的距離拉近，意即要將學術與實際加以結合^③。後藤在一生中以科學為基礎所推動的措施中為後人最稱道的是他治臺（一八九八～一九〇六）與經營滿鐵（一九〇六～一九〇八）時的政績，此時期為他在事業上的巔峯時代。因此每當提及後藤新平時，在

① 信夫清三郎，後藤新平——科學的政治家の生涯（東京博文館，昭和十六年），頁九～一〇。

②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後藤新平傳記編纂會，昭和十二年），頁八五四。

③ 信夫清三郎，後藤新平——科學的政治家の生涯，頁三四七。

潛意識中首先一定會想到他在南與北——即臺灣與滿洲兩地推行殖民政策的傑出表現。

後藤新平於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六月四日出生於當時的水澤藩（現在之岩手縣水澤市），水澤因係高野長英^④的出生地頗負盛名。高野死後七年後藤才出生，由於高野家與後藤家有親屬關係，後藤從小就非常景仰高野，並且受到高野自由奔放的思想的薰陶，對後藤日後不受拘束的性格影響很大。後藤在八歲時入武下節山門下攻讀漢學，因生性頑皮，使父母頭痛萬分，也令教師憤怒異常。雖然如此，他在武下塾，卻非常認真，成績不錯。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當後藤十一歲時，受僱於留守家為「奧小姓」（專門伺候藩主夫人等的男傭），工作之餘，仍前往武下塾繼續求學。次年（一八六八）明治維新發生，後藤一家奉命「土著歸農」（即回原籍從事農耕之意），這一紙「土著歸農」的命令，使年僅十二歲的後藤體會到新時代所帶來的急遽變化。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後藤任職於膽澤縣廳時，為該縣大參事安場一平（保和）所賞識，乃將後藤安置在阿川光裕（原名岡田俊三郎）家，並送他到立生館接受新式的教育。安場將後藤交給阿川時，曾對阿川說：「這個孩子將來具有擔任參議的資格，與其安置在我家，不如交給你照顧比較適當，希望你不要刻意去改變他的性格，最好聽其自由發展」^⑤。此為後藤在人生旅途上的轉捩點。

後藤在立生館求學期間，其頑皮的性格一如往昔，經常與該館教師伊藤玄泰因意見不同而發生爭執。某日，伊藤大怒，指其抗師無禮，竟致出手打後藤的頭，後藤雖然憤懣異常，無奈不能反擊師長，含淚對自己發誓，此仇一定要報，但所要報的仇無他，就是要充實自己的學問，超過老師幾倍^⑥。從此，後藤日夜發奮努力，

④ 高野長英（一八〇四～一八五〇），幼時在家鄉從外祖父坂野長安（是一位鄉醫）學習漢學，十六歲時前往江戶（東京）入吉田長叔門下，然後赴長崎師事於錫伯（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德國人，駐長崎荷蘭商館醫師）學習蘭學，為幕府末期著名的蘭學泰斗，對近代日本的思想影響很大。一八三九年（天保十年），因批評幕政，又被人誣告有偷渡海外意圖，導致發生「無人島事件」，高野與渡邊華山被捕，渡邊在獄中自殺身亡，高野被判終身禁錮。一八四五年（弘化二年）高野趁監房火警而越獄逃亡，目的為返鄉向其母親訣別，不幸於一八五〇年（嘉永三年）再度被捕，自刃身亡，享年四十七。高野與後藤因有親屬關係，後藤幼時曾被一羣玩伴罵為「叛逆之子」。參照高柳光壽、竹內理三，日本史辭典（東京角川書店，昭和四十七年），頁七〇九～七一〇。日本史事典（東京平凡社，一九八三年），頁二五七。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一卷，頁二二～三七。

⑤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一卷，頁八三。

⑥ 信夫清三郎，後藤新平——科學的政治家の生涯，頁二三。

學識因而大進，成爲當時水澤地方的父老寄予厚望的三秀才之一^⑦。

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後藤首次前往東京，爲生活與學費問題，受僱於太政官少史莊村省三家當家僕，由於不堪莊村家苛薄，又回到水澤老家。次年，阿川光裕調至福島縣廳服務，有意供應後藤的求學費用，但惟一的條件是要後藤專攻醫學。因阿川認爲後藤的性格志大豪放，不受任何拘束，如果一開始就讓他去做官，很可能會成爲政治犯，不如先讓他當醫生，以待他日伺機而爲。懷著躊躇大志的後藤當然不會滿足於醫生生涯，但是如果加以拒絕，則求學之途也許將因之而斷絕。在現實的環境下後藤乃於此年（一八七二年）五月，進入福島小學第一洋學校。所謂洋學校是爲了進入正規的醫學校而設置的預備學校。後藤在該校肄業期間，對於洋學並不感興趣，反而跟隨數學大師市川方靜鑽研數學與測量學，並聽信市川勸言積極準備爭取內務省的測量公費生，此舉很使阿川不滿，爲了不辜負阿川的一番苦心，不得不放棄測量學而進入福島縣立須賀川醫學校。後藤在該校始接觸到物理、化學、解剖學、生理學等近代科學知識，並深深被這些近代科學的魅力所吸引，他即以這些科學爲基礎，致力於奠定自己的世界觀^⑧。此應爲後藤走向以醫學治人治世的出發點。

須賀川醫學校終於把後藤磨鍊成醫術高超的醫師，畢業時，他的名聲不僅傳遍了須賀川地方，而且也是各醫院爭相聘請的對象。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應聘鶴岡醫院，薪水高達三十五圓，但不到兩個月即轉至名古屋的愛知縣立醫院擔任三等住院醫師，薪水僅十圓。後藤之所以降格以求，固然與他的恩人安場保和及阿川光裕任職於名古屋有關，但是最重要的是名古屋爲僅次於東京及大阪的日本第三大城市，研究環境較佳，尤其是當時奧地利的名醫勞倫斯博士及日本醫學界的巨頭司馬凌海皆在該院服務，使後藤嚮往不已。果然在勞倫斯及司馬的指導下，後藤的學術與醫術精進，確立了日後他在醫學界的地位^⑨。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發生，不少傷患被送至大阪陸軍臨時醫院治療，後藤爲吸取更多臨床經驗，毅然辭去愛知醫院，在大阪陸軍臨時醫院後藤結識了石黑忠惠等醫學界的前輩。在名古屋時期，後藤在中央的醫學界已漸漸嶄露頭角，在大阪半年的經驗使他磨鍊成一位頂尖的外科醫師。大阪陸軍醫院關閉後，他

⑦ 是指山崎周作、齋藤實與後藤新平等三人，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一卷，頁八六。

⑧ 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二五～二六。

⑨ 同上書，頁二八。

又回到愛知縣立醫院。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奉命代理該院院長，一八八一年正式接任院長，此時後藤年僅二十五歲。

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自由黨領袖板垣退助在岐阜縣作巡回演說闡揚自由主義時被刺——即「板垣遭難事件」^⑩，後藤接到急救電報，認為人命關天，乃排除萬難，漏夜由名古屋趕往岐阜^⑪，當後藤趕到時，看到板垣氣色很好，脈搏正常，沒有發燒，乃說：「閣下，該做的也做了，死也無憾了」，板垣答稱：「不錯，如果死了，也死得其所」。後藤離開後，板垣對左右的人說：「他是一位氣質非凡的人，只可惜沒有當政治家，如果他將來從政，將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⑫。雖然這是一段小插曲，當時後藤確為板垣所賞識，徵諸日後後藤的表現，實在應驗了板垣的話。

一八八三年（明治十六年），後藤出任內務省衛生局技師，此為他擔任衛生行政工作之始。他自技師晉升至衛生局長（一八九二年）時，曾撰寫「普通生理衛生學」、「國家衛生原理」、「衛生制度論」等論著，作為他推動全國衛生業務之依據。除此，還創設傳染病防治研究所，建議設立統計局等，皆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出發點，此與他出任衛生局長前，留學德國（一八八九～一八九二）之兼攻社會政策有關^⑬。

後藤在衛生局長任內，因「相馬事件」^⑭遭到池魚之殃，以誣告罪嫌被收押，並被免去局長職務，最後雖因證據不足，判決無罪開釋，但是自此以後，他對派閥與權勢益加痛恨，思想轉趨激烈，連曾力主拘捕後藤的陸奧宗光也說：「那個人（指後藤）如果不給他大椅子坐，讓他賦閒，也許有一天會起來組織社會黨」^⑮，知道他不是等閒之輩。

後藤經「相馬事件」後很感徬徨，而重振其信心，讓他展現其政治才華者為第

⑩ 遠山茂樹、佐藤誠朗，自由黨史（中）（東京岩波書店，昭和四十年），頁一三六。據說板垣被刺時瞪着刺客說了一句「板垣雖死，自由不死」的名言。

⑪ 依規定縣立醫院院長未經縣廳許可，不能往管轄地區以外出診，更何況板垣當時被日本政府視為叛逆之徒，遽然出診，後果不堪設想，但後藤還是毅然前往，處於官僚政治社會下的後藤，此時已有對官僚主義強烈反抗的意識，此舉也使他聲名大大提高。

⑫ 自由黨史（中），頁一四三。

⑬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東京朝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八年），頁二九。

⑭ 明治時期相馬藩（今福島縣）中村城主相馬誠胤，因精神病被非法監禁導致死亡事件。後藤因參與控告不法監禁誠胤之事，遭到無妄之災。見日本歷史大辭典，第六卷（東京河出書房新社，昭和四十四年），頁二六〇。

⑮ 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六七。

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兒玉來臺就職之初，即聘任後藤爲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又任命後藤爲民政局長（後改爲民政長官）。後藤在臺灣民政長官任內（一八九八～一九〇六）不但摒棄日本人士主張放棄臺灣的論調，認爲經營殖民地爲近代帝國主義發展的趨勢^⑭，而且不顧一切積極推展臺灣的近代化。

他認爲推動近代化的前提條件就是實行土地改革，換言之，土地改革爲促進封建的生產結構邁向近代化的原動力。如果土地不加以改革，田制紛亂，足以妨碍農業生產的發展。他深深體會到要確立各種行政基礎，必須要有明確的地籍（即土地調查）與人籍（即戶口調查）。一八九八年七月，先後公佈了臺灣地籍規則及土地調查規則，九月間成立「臨時臺灣調查局」，並自任局長，隨即展開土地調查工作。此項工作包括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地形測量等，工作繁雜而龐大。竹越三又（「臺灣統治志」作者）評稱：「此項工程之鉅大與科學化，使人驚嘆」，又稱：「明治七年的地租改革，如跟它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⑮。至於人籍方面，於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制定戶口調查規則，兩年後實施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

因實施土地調查的結果，不僅使臺灣的小租戶擁有自己的土地，也明確地規畫了地理地形，便於治安工作；由於重整隱田，增加不少土地甲數，也確立了土地的權利關係，經濟活動因此活絡起來。當然此舉給日本國內的資本在臺灣從事土地的投資或開創企業上，提供了安全感。

後藤在臺灣民政長官任內所標榜的「三大事業」及「三大專賣」^⑯是爲他治臺成功的重要因素，也因此使過去貧瘠的臺灣成爲日本的寶庫之一，使日本民族首次對異族統治的考驗，贏得安定與信心。除此，他更引進近代機械化的製糖技術，創設臺灣製糖會社^⑰，奠定臺灣製糖業發達的基礎。

總之，臺灣經後藤的銳意經營，不到九年時間，不但使臺灣成爲自給自足的殖民地，也使過去力主「放棄臺灣論」的人士的憂慮一掃而空。後藤常如此回憶：「經營臺灣能獲得如此成果，是重用優秀的學者與技術人員的結果」^⑱。由此可知，

⑭ 同上書，頁一〇一～一〇六。

⑮ 同上書，頁一〇七～一〇八。

⑯ 三大事業是建造鐵路，修築港口與土地調查。三大專賣法是指鴉片、樟腦、食鹽等專賣。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二二七～二二八。

⑰ 對臺灣製糖業的改進貢獻最大的是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長的新渡戶稻造，新渡戶出任此職，是出於後藤之大力推薦。目前日本使用的五千圓新鈔上的人物像就是新渡戶稻造。

⑱ 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一三九。

政治與科學的結合，是他最常運用的政治哲學。不過後藤在臺灣的治績，也大半要歸功於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大力支持，他們兩個人的確是一對最佳的政治搭配。後藤因治臺獲授男爵，有人因讀音之相似戲稱為「蠻爵」或「蕃爵」，而他也樂於此種稱呼，因為它一方面代表榮銜，一方面也代表着他那桀敖不馴的性格^①。

一九〇六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後藤由臺灣轉至滿鐵任首任總裁，他在任雖不到兩年，滿鐵的一切事業基礎卻是由他一手奠定的。他在臺灣與滿洲的時期，是為他的政治生涯中的巔峰時期。

一九〇七年九月，在嚴島會晤伊藤博文，討論世界局勢，伊藤在哈爾濱遇刺身亡，肇因於此次會談。^②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七月，第二次桂太郎內閣成立，後藤被延攬入閣任遞信大臣，十二月兼鐵道院總裁。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十二月，仍任第三次桂太郎內閣的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次年去職。一九一六年十月任寺內正毅內閣的內務大臣兼鐵道院總裁。

一九一七年年底，英法向日本提出出兵西伯利亞之議，外相本野一郎極力贊成，但與主張持重論的首相寺內之意見相左而去職，後藤乃於一九一八年四月，由內務大臣轉任外務大臣。但後藤也是極力主張出兵，其理由係基於確保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他認為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是自衛之策。他強調出兵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一）防範德國勢力之東漸，（二）確保日本的國際地位，（三）確保日本在和平會議時的發言權，（四）抗衡美國在西伯利亞之活動，（五）振奮日本民心，（六）貫徹對華政策^③，並撰文對反對者加以反駁^④。他認為基於援助西伯利亞獨立的形式下出兵，不僅能預防因出兵所帶來的危險，而且也可以藉此化解俄國人民的反感，出兵國之間的願望也可以獲得緩和^⑤。

西伯利亞出兵是後藤在外相任內所面臨的最大課題，無論在國際上或日本國內引起軒然大波，但後藤仍然排除一切困難，在元老會議上得到元老的諒解並說服首相寺內，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發表了出兵宣言^⑥。西伯利亞出兵因蘇維埃政府的

① 同上書，頁一四九。

② 伊藤博文與後藤新平在嚴島之會談內容，後藤加以手記，名為「嚴島夜話」。談話內容主要是後藤向伊藤請教其對世界局勢的看法。談話中後藤曾勸伊藤不妨會晤俄國首相柯柯夫（V. N. Kokovtsov），導致一九〇九年十月伊藤在哈爾濱遇刺死亡，後藤內心歉疚不已。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九七四～九七七。

③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三卷，頁八九四～八九八。

④ 同上書，頁八九八～九〇三。

⑤ 同上書，頁九〇三～九〇六。

⑥ 同上書，頁九三〇。

奠定而落幕，美國及英法自西伯利亞撤兵，日本卻依然駐紮七萬三千名軍隊於西伯利亞，日後導致了「尼港事件」^⑳。此事件雖與後藤無關，卻導源於其強硬的出兵論，實為後藤的政治生涯中，最感遺憾之事。一九一八年九月，寺內內閣因西伯利亞出兵及「米騷動」問題而總辭^㉑，後藤也掛冠而去，出任外相為時僅五個月。

一九一九年三月，後藤前往歐美作為期八個月的考察旅行，他參觀美國的聯邦標準局及英國格林威治理化研究所時，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醞釀了設立大調查機關的構想。他認為日本目前的各調查機關，不僅規模小而且局限於局部的調查，不能因應世界的局勢。他設置大調查機關的目的在於蒐集世界各國的情報並派遣年輕的政府官員前往國外進修，培養人材^㉒。因編列的經費過於龐大（五年為一期，每期經費為二千五百萬圓），不被原敬內閣接受，以後加藤友三郎、山本權兵衛、清浦奎吾、田中義一等組閣時，雖一再爭取，結果他的構想還是胎死腹中。

一九二〇年，後藤出任東京市長，他在東京市長任內的首要工作就是實施職制改革與人事刷新，目的是為了打破官僚主義，也等於向東京市議會的一種挑戰。另一工作就是為改造東京市而提出的「東京市政綱要」，因實施這個計畫需要龐大的經費，所以世人稱之為「八億圓計畫」，也被評為「空洞而無責任的大包袱」^㉓。他在東京市長任內（一九二三年四月辭職），這個計畫沒有實現，但是一九二三年九月發生關東大地震後的東京市，卻大部分依據這個計畫實施重建工作。

一九二三年九月，山本權兵衛第二次組閣，後藤入閣任內務大臣，同年十二月，因內閣總辭而去職，此為他最後一次擔任公職，此後他自政界引退，專事於推動政治的倫理化運動，力倡普選，為此他馬不停蹄地前往各地去演講。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當他前往岡山市演講時，在途中病發（第三次腦溢血），十三日病逝京都府立醫院，享年七十三歲。

由他的生平中可知他喜歡擬定計畫，這是他一生中最受批評的地方，世人評稱他的計畫是一種「大包袱」，但是他辯稱自己對十五年以後的事情能看得很清楚，

⑳ 出兵西伯利亞後占據尼港（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廟街）的日軍於一九二〇年被俄人包圍，投降，因日軍不守協定而反擊，導致日本俘虜被殺，此事件曾引起日本的反俄情緒。見日本歷史大辭典，第七卷，頁四五七。

㉑ 因米價昂貴而發生於一九一八年七月至九月之間的民衆暴動運動，結果寺內內閣被迫下臺，政友會的原敬內閣成立，為日本最早的政黨內閣，原內閣擴大政治自由，成為日後民衆運動發展的基礎。見日本歷史大辭典，第四卷，頁六四一～六四二。

㉒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四卷，頁一七九～一八九。

㉓ 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三四七～三四八。

計畫也是針對它而擬定的，因此常常招致誤解，甚至受到前輩的反對。事實上，後藤是一位頭腦清楚做事講求原則的人，他不但是理想主義者，也是實行主義者。松岡洋右對後藤的「大包袱」有一種獨特的解釋。他說：「後藤所以被世人評為大包袱，這是因為他的思想不僅具有先見性，其計畫規模也比一般龐大。他既不是說夢話者，也不是吹牛者。如果冷靜地加以考量，其大包袱大部分都能確實實踐，因為他的牛一吹，都能將它付諸實行，因此他不愧為一位偉大而自由的創見者」^{③①}。

後藤認為政治家要具有科學的素養，對於政治的基礎建立於科學的原理，要有所認識。他曾批評當時的政治家只具有新聞知識而缺乏世界遠見。所以他說：「目前的政治家大多屬於新聞的政治家，只有少數是屬於雜誌的政治家，至於科學的世界性的政治家，則一個也沒有」^{③②}，他期許自己為科學的世界性的政治家。由此可知後藤自視甚高，也因為如此，他的一生似乎是孤立的，因為他沒有得到太多志同道合的人，這也許與他沒有組織派閥有關，因為打倒派閥是他一貫的主張。但是有一件事實不能否認，那就是他深知科學的重要性，堅信知識能支配人類，在他一生的從政過程中，始終沒有忘記這個原理^{③③}。

三、滿鐵的發軔與後藤的佈署

滿鐵係日俄戰後依據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日俄所簽訂的樸資茅斯條約第六條「在清國政府承認下，俄國願意將長春（寬城子）旅順口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並附屬於同地方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並在同地方屬於該鐵路或為其利益而經營的煤礦轉讓給日本政府」的規定^{③④}與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簽訂的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經清廷同意，而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組成的（一九〇七年四月一日正式營業）。

早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初見勝利時，當時的參謀次長兒玉源太郎曾命服務參謀本部的上田恭輔調查有關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性質、組織及其事業等資料，此時兒玉似已有了創設滿鐵及如何經營滿洲的腹案，事實上，這是出自後藤的建言。

在臺灣有多年殖民經驗的後藤，想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模式來經營滿洲。一九

③①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七六八。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三一。

③② 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三二一。

③③ 山田豪一，滿鐵調查部——榮光と挫折の四十年（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昭和五十三年），頁七。

③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大連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正八年），頁三～四。

○五年八月，媾和事宜將有眉目時，後藤前往戰地拜晤兒玉（當時仍任臺灣總督而且還任參謀次長並以滿洲軍總參謀長身份在滿洲督戰），此時後藤已擬定了經營滿洲的具體草案，這就是「滿洲經營策梗概」（一稱樸資茅斯條約締結前故兒玉大將之立案）。其內容如下：

戰後經營的要訣在於陽為經營鐵路，陰為實行各種政治發展措施。

依據這個秘訣，應將租借地內的統治機關與鐵路經營機關截然分開，而鐵路經營機關應妥為掩飾除鐵路外與政治軍事毫無關係。

租借地的統治機關，以目前正在討論中的遼東總督府充當。另外創設經營滿洲鐵路的機關，由政府直接管轄，令其負起鐵路之營運、路線之守備、鑛山之開採、移民之獎勵、地方之警察、農工之改良、與俄國及清廷之交涉事件、整理軍事情報等任務，平時也兼辦一些鐵路隊之技術教育。

此次所獲得的鐵路，包含由長春至大連的幹線及不少支線，因有部分路線須通過遼東總督管轄地內，總督府與鐵路廳之間難免發生衝突，為防範類似情事，鐵路廳長官應由都督兼任。鐵路守備隊由遼東總督所屬部隊擔任，至於守備任務須受鐵路廳長官之指揮³⁵。

以上的草案雖然很籠統，但以鐵路來經營滿洲的策略即萌芽於此，日後成立的滿鐵，即以這個構想作為藍圖的。

日本獲得長春以南的鐵路經營權之初，為因應戰後遣散軍隊及兵器、糧秣、軍需品等的運輸，將它委託給野戰鐵道提理部掌管，戰後一年半左右的滿洲是在軍政的統治之下，這是一時權宜之計。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首相官邸召開了「元老閣僚會議」（一稱滿洲問題協議會），經營滿洲的方針，在此次會議上作了重大的決定。與會者為：

伊藤博文（侯爵 朝鮮統監） 山縣有朋（侯爵 樞密院議長） 大山巖（侯爵 元帥） 西園寺公望（侯爵 內閣總理大臣） 松方正義（伯爵 樞密顧問官） 井上馨（伯爵 樞密顧問官） 寺內正毅（陸軍大臣） 齋藤實（海軍大臣） 阪谷芳郎（法學博士 大藏大臣） 林董（子爵 外務大臣） 桂太郎（伯爵 陸軍上將） 山本權兵衛（男爵 海軍上將） 兒玉源太郎（子爵 參謀總長）³⁶。

³⁵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六五一～六五二。

³⁶ 同上書，頁六五四～六五五。

此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撤除滿洲的軍政統治而改行民政問題。日俄戰後的滿洲由於受到英美等國的外在壓力，不得不由軍政改行民政，這是召開此次會議的主要原因。伊藤博文在會中談到英美等國對日本在滿洲實行軍政統治的抱怨，並出示英國駐日大使竇納樂（Sir Claude M. MacDonald）給他的私函，說明目前英美等國的貿易圈人士一致埋怨駐紮滿洲的日本軍憲以軍事行動對外國貿易加以種種限制，滿洲的門戶較俄國時代更為封鎖。伊藤即以滿洲的封鎖主義分析利害關係，他說：「依本人的看法，現在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策略，無非是把日俄戰爭期間同情日本並提供軍費給日本的友好國家，與之疏遠，這是自殺的政策。各國所以同情日本並提供軍費，是認為日本能代表開放主義，而且日本是為開放主義而戰，然而本人曾聽說目前軍事當局所以對滿洲實施不開放政策，是因為害怕俄國報復。此說固然言之成理，但日本將因此失去各國的同情，將來一旦發生戰事，將蒙受很大的損害，相信國內有很多政治家已經知道這是很愚昧的政策」^②。伊藤甚至認為軍政統治也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尤其是在中國正醞釀收回利權聲中，將對日本產生不良的結果。伊藤最後的結論是廢除軍政署。

伊藤為明治維新後的元老重臣，一言九鼎，而且外交經驗豐富，他的基本想法是為因應當時的世界局勢，宜於採用較為開放的政策，在座的元老閣僚中如山縣、大山、桂、山本、兒玉、寺內等皆為當時的軍事重鎮，尤其又逢日俄戰後，軍人得意非凡，伊藤在此時敢於提出如此建議，除了個人的尊崇地位之外，實為因應當時的局勢使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文治派對軍治派（即武斷派）的一種挑戰。為顧及大局，軍治派只有退讓，答應逐漸廢除滿洲各地的軍政署^③。

軍政署既廢，經營滿洲的中心機關，自然落到後藤與兒玉研擬的鐵路公司頭上，一九〇六年六月七日，日本政府正式公佈滿鐵組織規程二十二條^④。至此，滿鐵正式誕生，此為日本在滿洲殖民史上的一件大事。

滿鐵成立，緊跟而來的就是總裁的人選問題，因為滿鐵身負經營滿洲甚至將來伸張勢力於大陸的重任，其領導人物關係著日本殖民政策的成敗。一九〇六年初，由外務省、遞信省、大藏省官員組織了「滿洲經營委員會」，以兒玉源太郎為委員長，負責籌劃經營滿洲事宜，及至滿鐵組織規程公佈，兒玉曾屬意當時擔任朝鮮統

② 同上書，頁六五六。

③ 同上書，頁六五八。

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一五～一八。

監府鐵路管理局長官的古市公葦出任滿鐵總裁，但古市以自己僅為技術人材不能勝任此一艱鉅任務為由加以婉拒，並推薦後藤^④。因當時後藤在臺灣，不便更動，總裁人選問題遂暫時擱置。五月二十二日的「元老閣僚會議」中，卻由軍部巨頭山縣有朋首先推舉後藤為總裁，經文治派的大將伊藤博文及首相西園寺公望的極力支持，總裁人選終告定案。

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後藤的友人杉山茂丸，以電報告知後藤此一消息，並勸他接受^④，也意味著要後藤在心理上應早作準備。不久後藤又接到內務大臣原敬約其回國的急電，七月二十二日返抵東京，隨即晉謁西園寺、兒玉、山縣等，但婉拒出任總裁。不料，七月二十三日，兒玉溘然去逝，此對後藤而言，如同晴天霹靂，兒玉之死，使後藤的心意，作了很大的改變，那就是他已下定決心就任滿鐵總裁，藉以慰兒玉在天之靈。但是後藤所顧慮的是就任後所受的外部干涉與內在壓力問題，在作正式承諾之前，必須將這些問題加以解決。

首先，後藤所顧慮的就是軍部的橫加干涉。他深知滿洲權益的獲得是以日本將士的血汗所換來，滿洲的一草一木，對他們都是感觸良深，在彈藥未消，血跡未乾的當時，軍人對滿洲的經營一定會要求發言權。但是後藤認為既然戰事已經結束，就應該撇開戰時體制下的觀念，另外樹立經營滿洲的大方針，如果軍部對滿鐵的經營方針加以不當的干涉與壓迫，無異於戰爭狀態的延續，文官的建設計畫純然無從展布。

後藤常說，治理殖民地並不難，治理內地（日本國內）的官僚思想才是難事，這是後藤在臺九年的經驗談。他認為兒玉之所以令人敬佩，並不在於他有開拓新領土（即臺灣）之功，而功在於他致力於打破國內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④。因為後藤在臺期間，軍政與民政多有傾軋，但兒玉在背後大力支持文治政策，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他很擔心兒玉死後能否憑一己之力克服滿鐵的種種障礙，更何況滿鐵在形式上只是一個商社性質的公司，在滿洲還有代表軍部的都督府及外務省的駐在地領事館，與滿鐵形成「三頭政治」。滿鐵被夾在其中，能否發揮它經營滿洲的中心機關的功能，很值得懷疑。後藤認為如要達到公司所負的使命，則非採取特殊的措施不可。

④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三九。

④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六六〇～六六二。

④ 同上書，頁六六三。

後藤是一位頭腦清楚，做事細密的人，他認為要打破第一重障礙，滿鐵總裁應該兼任關東都督府顧問，如此，滿鐵總裁不僅可參與都督府之行政實務，又可避免因都督府與滿鐵之間意見不一致時而缺少溝通協調。他提出的這個條件，終於獲得當局的答應。

其次要解決的是臺灣民政長官的問題，臺灣經後藤九年的慘澹經營，成績卓著，但是許多計畫猶待推進，後藤實在不太願意拋開臺灣的事業，所以他在東京晉謁山縣時曾說：「如果我就任滿鐵總裁，臺灣的事情怎麼辦？」，經山縣考慮後提出折衷辦法，那就是將就任總裁的日期延至次年二月，在這期間內，擬妥治理臺灣的根本方針，山縣的一番話也多少打動了後藤的心。後藤隨即電告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佐久間回電表示贊成並促後藤早日赴任^{④③}。佐久間的此一回電，等於給滿鐵總裁的誕生一針催生劑，後藤出任滿鐵總裁問題，總算塵埃落定。

後藤雖然已答應出任滿鐵總裁，然而他一直關心臺灣問題，因此他又提出另一個條件，那就是在臺灣總督府設立顧問制度，由他兼任顧問，如此，他又可參與臺灣的政務，但此一構想必須得到總督佐久間的同意。一九〇六年九月，後藤致函佐久間徵求其同意，並請其諒解。佐久間對此甚感不快曾表示：「源太郎（指兒玉）時代不必要的東西（顧問制度），為何在我的時代就需要？我雖然是一介武夫，對政治及學問無緣，但是既然受命為臺灣總督，也不至於無能到沒有設置顧問就不能統治臺灣的程度」^{④④}。但是顧問制度係經元老與內閣的同意而設置，佐久間為顧全大局，在百般無奈下，只好表示同意^{④⑤}。

依據一九〇六年七月頒佈的關東都督府官制，滿鐵應受關東都督及外務大臣之監督指揮^{④⑥}，後藤深感「三頭政治」之弊害，除前面所提取得兼任關東都督府的顧問外，為了使滿鐵與關東都督府之間更能密切配合，下一步棋即免去副總裁中村是公之職，使之轉任關東都督府民政長官，此舉雖經關東都督同意，但外務大臣林董卻以民政長官在旅順，副總裁在大連，兩地相隔，奔走不便為由，表示異議，後藤因此放棄這個念頭，仍令中村專任滿鐵副總裁之職。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後藤正式就任滿鐵總裁。

④③ 同上書，頁六三三～六三五。

④④ 同上書，頁六三八。

④⑤ 臺灣民政長官的繼任人選，頗使後藤感到困擾，最後決定留下心腹之一的祝辰己繼任，另一心腹中村是公則帶至大連任副總裁，中村於一九〇八年繼後藤出任滿鐵總裁。

④⑥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六五。

後藤出長滿鐵，除從臺灣帶來一位伙伴——臺灣總督府財政局長中村是公使其擔任副總裁外，即著手物色尚未成名而將來可能成大器的年輕人作為他的左右手。後藤的用人原則有三：(一)「午前八時主義」（富有朝氣的年輕人），(二)好高騖遠者不用，(三)年長而頑固者不用^④。「午前八時主義」因而成為後藤的註冊商標。根據上列原則，他首先羅致三井物產公司長崎分社長田中清次郎及門司分社長犬塚太郎，其次又陸續聘請栃木縣知事久保田政周、秋田縣知事清野長太郎、鐵道省技師國澤新兵衛、京都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等六人為理事。這六人中，除中村是公、國澤新兵衛、清野長太郎等人的年齡超過四十歲以外，其餘皆為三十出頭的青年才俊（後藤出任滿鐵總裁時為五十歲）^⑤。後藤也很鼓勵年青社員進修，需要的書刊皆動用公司的經費購買，他在總裁任內，滿鐵社員組成「自修會」（一九〇七年），發刊「自修雜誌」，該刊物於一九一四年六月起改稱「讀書會雜誌」，一九二七年三月又改稱「協和」，直至二次大戰結束才停刊^⑥。

無可否認，滿鐵成立之初，不少日本人士對於這個具有多重性格的公司不抱樂觀態度，然而後藤在臺灣多年的殖民經驗以及在他細密的計畫下，順利推展各種措施，奠定了日後滿鐵的穩固基礎。

四、「文裝的武備」的殖民理論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是一個中世紀封建式的國家，被排除於世界史主流之外，及至德川幕府崩潰及明治維新成功，始由封建邁向現代化。至十九世紀末葉，日本已與西歐列強並駕齊驅，一躍而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乃仿倣西歐資本主義列強主張「殖民膨脹權」，積極對外尋求殖民。甲午戰後殖民臺灣，是為達到這個主張的最早成果。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結果，又給日本伸張勢力於滿洲的機會。

依據樸資茅斯條約及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日本確保了關東州的租借權與南滿

^④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七二。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六九四～六九五。

^⑤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六九九。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六四～六六。後藤羅致人材時一波三折，煞費苦心，尤其聘請岡松參太郎時，受到文部省及京都大學當局的刁難，經後藤撰文駁斥，才放人。

^⑥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二五七～二五八。

洲鐵路的經營權，關東都督府與滿鐵，因而成爲日後日本經略滿洲的兩大機關，也是確保日本在南滿特殊權益的兩大支柱。當日俄戰爭末期日本勝利在望時，日本朝野已開始討論戰後如何經營滿洲的問題，當然以經營鐵路作爲殖民滿洲的主幹爲日本上下一致的主張，但殖民的基本方針及形態，則意見紛紜。

當時對於經營滿洲有兩個潛在因素使不少人憂心忡忡，那就是俄國的復仇與日本的經濟負荷問題^⑤。尤其是前者，最受到關切，以當時日本的處境而言，顧慮俄國的報復，並不是沒有道理。戰後俄國的外交大權雖然掌握在對日本採取溫和態度的威特（Witt）與羅辛（Rosen）等手中，然而以軍部爲中心的一派擴張主義者，依然擁有很大的勢力，他們還公然宣稱樸資茅斯條約祇是暫時的休戰條約，是藉此恢復國力伺機再行報復的一種手段而已^⑥。由此可知日俄戰後日本的國策係以防備第二次日俄之戰的發生爲前提，對於滿洲的經營當然也是配合這個方針而展開的。

持這種見解者咸認爲滿鐵除正常的業務營運外，應能充分發揮軍事與國防的功能，當時的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是抱持這個見解的代表人物。在樸資茅斯條約簽訂以前兒玉所提出的「滿洲經營策梗概」（該梗概爲後藤所擬）中首先就提到「戰後經營滿洲的要訣在於陽爲經營鐵路，陰爲實行各種政治發展措施」^⑦，亦即滿鐵應盡量掩飾除經營鐵路外與政治軍事毫無關係。尤其後藤一再強調「日俄之衝突恐非滿洲一戰，就能收拾局面」^⑧。不難看出兒玉與後藤經營滿洲的策略，首要在講求因應俄國勢力的再度南下。

至於日本的財政問題，不少日本當政者認爲在廣大而尚未開發的滿洲荒野中經營鐵路，恐無經濟利益可言，每年的虧損或將導致日本的經濟危機，於是有「出售滿洲鐵路」及「委託經營」的主張，其主要的見解就是希望第三國共同參與經營滿洲的鐵路，如此不但可以緩和日俄間的緊張情勢，一旦有事，可由該第三國出面仲裁，同時也可以藉此一併解決因鐵路的再建與整頓所需的資金或資材的調度，進而可以分擔因營運所帶來的巨大的赤字等問題^⑨。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E. H. Hariman）即在此時表示興趣，公然表明收買滿鐵企圖而前往日本，不僅受到元老井上馨及財界巨頭澁澤榮一等人的歡迎並極力贊成，日本的悲觀論終於使首相桂太郎與

⑤ 滿史會，滿洲開發四十年史，上卷（東京滿史開發四十年史刊行會，一九六四年），頁一七八。

⑥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の史的考察（東京鹿島研究所，昭和三十三年），頁二二四。

⑦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六五一。

⑧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一一〇。

⑨ 滿洲開發四十年史，上卷，頁一七九。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二卷，頁七五五～七五六。

哈里曼之間簽訂了一紙買賣契約。然終因外相小村壽太郎（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的日本全權代表）的極力反對而解約⁵⁵。

滿鐵在表面上是一個鐵路公司⁵⁶，實質上它負有多種使命。後藤在滿鐵發軔之初，就已意識到滿鐵的任重道遠。他深知交通事業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命脈，產業、貿易能否拓展與交通的發達息息相關。他在「對大陸根本政策的覺書」中，就提到「一個國家在外國經營鐵路，其目的不只僅止於經濟利益，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拓展其殖民政策，為達到此一目的，必須得到軍部的支援與外交當局的協助。目前列強正在這方面作競爭，因此這條鐵路不論是官辦或民營，軍事及外交當局應給予配合。同時政府也應講求發展生產的方法，全力加以扶植，這個政策稱之為殖民的高等政策」⁵⁷。後藤的見解，在日本的殖民政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後藤無論在演講或書信中，對於經營滿洲常常會使用一句話，那就是「文裝的武備」，這是他經營滿洲的中心思想。所謂「文裝的武備」是以「文事的措施，以備他日侵略之用」，正所謂「揭王道之名以行霸道之實」，他深信這是本世紀殖民政策的不二法門⁵⁸。後藤的理論隱涵一個觀念，那就是武力獲得的果實，難以長久保持，唯有戰後從事建設，可望紮根落實。此即其「和平之戰」所指⁵⁹。

誠然，後藤所標榜的「文裝的武備」論，並不侷限於滿洲經濟的發展，他認為在教育、學術、衛生等各方面，也就是說在整個文化社會上，如果不能有堅實的建設，就談不到真正達成「文裝的武備」。換言之，在日本的大陸政策推行的過程中，首先必須顧及全體滿洲人民的生活，如此，當地人自然會歡迎日本，有了殖民地民眾的基礎，第三者則無從窺伺，大陸的經營就因此能達到鞏固而不至於動搖的地步。他一直強調殖民的最終目的是使當地人民皈依日本，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抓住他們的弱點及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後藤深知為政者要像律師與醫師一樣，能瞭解每位登門者的心理。因為律師與醫師能給他們解決困難，在心理上得到安慰與希望，並滿足他們的需要。宗教家也是一樣，常乘人心理迷惑時，給予講道，使在心靈上求得安慰，因此他們常博得人的信任⁶⁰。後藤出身醫學界，他把醫師藉醫術取

⁵⁵ 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下）（東京紅谷書店，昭和二十八年），頁二一一～二一二。

⁵⁶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三。依樸資茅斯條的第七條規定，滿鐵的經營僅限於商業，不可作為軍略目的之用。

⁵⁷ 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二〇五。

⁵⁸ 同上書，頁二〇八。

⁵⁹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八一五。

⁶⁰ 同上書，頁八一六～八一七。

信於人的道理用在殖民政策上，無非是要致力於建設殖民地，藉有形的建設成果滿足當地人民的需要，使他們在無形中自然而然皈依日本^①。後藤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善用各種科學的理論，作為殖民政策的依據，實為當時日本政界或軍界人士望塵莫及。

移民滿洲是後藤實施其「文裝的武備」的策略之一。他在「滿鐵總裁就任情由書」中，有一段提到移民的重要性。他說經營滿洲的方法不外「(一)經營鐵路，(二)開採煤礦，(三)移民，(四)講求畜牧農工業的發展，其中應以移民為第一要務。目前有一些對韓國的宗主權抱持膚淺看法的人，總以為歸功於戰勝或外交，殊不知韓國宗主權的獲得並不是那麼單純而急成的，這是日本的移民較其他列強眾多所造成。同樣的，也可以將這個事實，拿到滿洲去實施。如因經營鐵路而於十年內，將五十萬的日本人移入滿洲，俄國再頑強，相信也不敢冒然向日本開啟戰端，如此，和戰緩急之權均操之在日本，縱使開啟戰端而不幸日本戰敗，仍可保有捲土重來的地盤……戰爭不能保證常勝，而要保持永久的勝利只有維繫於民口的消長一途……如果日本在滿洲擁有五十萬移民與數百萬畜產，戰機對我有利，進而可作為侵略敵國之需，如果對我不利，可以儼然不動，用媾和方式以待時機」^②。

後藤的上述理論，是為防範俄國勢力的再度南下引發出來的移民論，在殖民地大量移民，一旦有事，不僅進可攻退可守，而且他日中國要求收回滿洲時，如有數十萬移民永借土地，可以做到久借荊州而不還的地步。後藤的移民論也可以說是一種土地占有主義^③。不少日本政要也持相同的見解，如一九〇九年外相小村壽太郎主張集中移民至滿鮮地區，全力經營，這種見解稱之為「滿韓移民集中論」^④。後藤的這種以移民造成既成事實的理論，是仿效普法戰爭後德國在亞爾薩斯、洛林地區(以下簡稱為亞、洛地區)實施紮根所得的啟示，這與他留學德國時的見聞有關。

後藤又主張仿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模式經營滿鐵。他取法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間接侵略方式，但卻不主張其掠奪手段^⑤，所以他說滿鐵與東印度公司實有相異之處。他對俄國經營東清鐵路的方式也不表苟同，認為東清鐵路主要是俄國的軍事侵

① 山田豪一，滿鐵調查部——榮光と挫折の四十年，頁一〇。

②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六六九～六七〇。

③ 安藤彥太郎，日本人の中國觀（東京勁草書房，昭和四十六年），頁八〇。

④ 同上書，頁八〇。

⑤ 東印度公司採行「現地主義」，即賦予負責人（都督或總裁）全權，不受官僚政治的法律規章約束，放手去經營殖民地。後藤曾以此種方式治臺，政績卓著。見草柳大藏，前引書（上），頁四六。

略機關，而滿鐵則為配合開發滿洲而創設，其任務是多方面的，因此滿鐵不僅能給日本的殖民地帶來繁榮，也能改善當地民眾的生活環境。他在滿鐵總裁任內，無不以協力、協和的思想灌輸給社員，而社員在潛移默化之中，也深深地把民族協和的思想銘刻於腦中⁶⁶，因後藤認為要收到殖民效果，社員本身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已經略為提到後藤認為新殖民政策的訣竅，與其由武力或經濟著手，不如首先求諸於文化建設，而文化建設中，與民眾最密切者莫過於宗教、教育、衛生等三項。他一再強調在殖民地一定要先興辦學校，其次建立寺廟，然後再興建醫院，後藤在這方面的確也費了不少心力。這種文化建設方面的「文裝的武備」，後藤稱之為「奠定殖民政策基礎的間接設備」⁶⁷，其效用正如前面所提與滿足當地人民的需要，籠絡民心，息息相關。

後藤經營滿洲的理論，不用「侵略」的字眼，而巧妙地使用「文裝的武備」，其實兩者是一體的兩面，最終目的同樣是厚植勢力於滿洲，進而控制整個中國。不過他使用「文裝的武備」，背後另有一種目的，那就是有意向戰後在滿洲蠻橫的軍部挑戰。「文裝的武備」與「軍裝的武備」是互相對立的。後藤認為所謂武備，不一定侷限於軍事，如果不充實民力，武備也無由發揮⁶⁸。當時日本軍部為防範日俄再度發生戰爭，力主以軍事力量維持滿洲的秩序，而後藤的「文裝的武備」論，等於對軍部主張的否定。後藤老謀深算，認為軍人的武斷行為對殖民事業的推展是一種障礙，更會引起當地人民的強烈排斥，將給殖民事業帶來不良影響。證諸日本近代的政治史，凡軍人干預政治時，必會引發不幸事件，如對華之軍事侵略及發動太平洋戰爭等是為明證。後藤認為久遠之計，應盡量避免軍事冒險，用文裝作掩飾，採行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各種建設，收攬人心。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實為一個成功的事例。後藤在臺灣民政長官任內，雖然是軍治時代，但總督兒玉能配合他的文治措施，此與奠定臺灣殖民事業成功的基礎大有關係。

後藤一再強調經營滿洲要參照東印度公司之對印度，德國之對亞、洛地區的殖民方式，在不動聲色之中，厚植殖民勢力。他尤其推崇德國在亞、洛地區大力推動文化建設，為配合該地的自然環境特別重視職業教育，不僅使該地區成為德國職業教育的重鎮，也成為有名的文化區。後藤一定盤算過滿洲的面積與亞、洛地區比

⁶⁶ 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東京勁草書房，昭和三十九年），頁一一～一二。

⁶⁷ 同上書，頁一六。

⁶⁸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八一—九。

較，不可同日而語，如果將滿洲善加經營，則滿洲對日本所產生的功能，何止於亞、洛之對德國，是為日本進而伸張勢力於中國大陸的最大資本，其策略之善用及識見之長遠，不愧被認為當代日本有名的殖民專家。

後藤把「文裝的武備」視為二十世紀的殖民政策，為新帝國主義時代所必須講求的殖民理論。無可否認，他之對治臺、治滿有如此的成績，證明他善用了這「文裝的武備」的理論，此舉亦為評價後藤的殖民政策功過的重要關鍵^⑥。

五、調查事業的倡導

後藤新平常以科學的調查求取自己立腳的地步，並根據科學的調查結果樹立自己的政策，因此有人對後藤評稱：「調查對後藤而言，就像皮包一樣，隨時隨地提在身邊」^⑦。調查事業是後藤所標榜的「文裝的文備」下直接推動的措施之一。他認為「凡近代的企業，應以科學的調查研究作為其合理經營的基礎，尤其負有特殊使命的滿鐵，其事業範圍極為廣泛，為了推展公司業務，當然需要多方設置調查機關」^⑧。滿鐵既為日本殖民滿洲的執行機關，調查機關的設立，即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當然調查機關的功能並不是直接推行殖民政策，而是為了能有效推展殖民政策所採取的一種手段^⑨。

滿鐵因負有特殊使命之故，所以其調查機關的職責，除站在營利的立場外，在某種情形下須配合日本的國策，其調查工作自然較一般更為錯綜繁雜。後藤在滿鐵總裁任內，先後設立了三個具有不同功能又不相統屬的機構，從事不同的調查工作。茲分別介紹於後。

1. 滿鐵調查部

該部於一九〇七年四月創設於大連總社。滿鐵初期的組織，分(一)鐵道部（經理鐵路、港灣、煤礦等），(二)地方部（經理附屬地之行政、文化等），(三)調查部等三個部門，成為該公司的三大支柱。調查部既為滿鐵的三大支柱之一，不難理解後藤

^⑥ 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一八。

^⑦ 信夫清三郎，前引書，頁三〇。

^⑧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東京龍溪書舍，一九七六年），頁二三六五。

^⑨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一九八四年），頁三五—。

對調查事業的抱負及期望之殷切。他之所以特別設立調查部，猶如松岡洋右所說是爲了「鞏固國策基礎」^⑬。後藤在臺期間曾動員織田萬、岡松參太郎等著名的學者編纂清國行政法及實施大規模的臺灣舊慣調查工作。臺灣的舊慣調查，給他日後在臺灣的殖民地行政上幫助很大，他在臺灣民政長官任內，政績斐然，實歸功於此。滿鐵調查部的構想是依據他治臺的經驗而來，也可以說是後藤展現其「統治哲學」的另一開端^⑭。

調查部設立之初的首要工作就是設立滿洲舊慣調查班，展開調查工作。他認爲土地與舊慣調查是經營大陸的前提條件，能瞭解一個民族有關經濟的法律與慣例才能鞏固殖民政策的基礎。岡松參太郎也很強調舊慣制度調查的重要性。他說：「研究與本國的人情風俗不同的殖民地的舊慣制度，並據此制訂定最適合該地的法律，是殖民統治上最根本的」^⑮。後藤每提到殖民政策時常用「鯛魚的眼睛與比目魚的眼睛」作比喻。他從生物學上解釋鯛魚的眼睛長在頭的兩側，比目魚的眼睛只長在頭的一側，雖然如此，兩種魚照樣可以生存。政治也是一樣的道理。殖民地有其固有的法律慣例，必須作詳細的調查，而後擬訂一個適切的措施，絕不可以將本國的法律勉強套在殖民地上，這種理論，後藤稱爲「生物學的殖民政策論」^⑯。

後藤更從解決國際糾紛的立場來分析一個民族固有的風俗習慣的重要性。他說在中國領土內經營鐵路事業，可以料想將來無論在商業上或民事上，難免會與當地官民發生糾紛，一旦發生糾紛，如交給中日司法機關或訴諸國際裁判，則事情往往弄得複雜難解。實際上以這個途徑解決問題，是不懂殖民政策權術的人所採行的「粗心武斷的強硬論」。過去所以會有因些小的糾紛而失去民心，使殖民政策受到影響，就是因爲這種「粗硬之見」所造成。所以他強調如發生糾紛，除非萬不得已應盡量避免對簿公堂，此時若啟用一位熟稔當地法律慣例的人與之交涉，私下解決，很可能比對簿公堂更爲圓滿^⑰。舊慣調查的重要性一如上述，而滿鐵調查部的首要工作在於滿洲的舊慣調查，其用意也在此。

滿鐵調查部首任部長是由理事岡松參太郎兼任，岡松曾經在臺灣實際參與該地的舊慣調查工作，經驗豐富。後藤聘請岡松擔任滿鐵理事時，京都大學及文部省以

⑬ 松岡洋右，滿鐵を語る（東京第一出版社，昭和十二年），頁一八二。

⑭ 草柳大藏，前引書（上），頁三一。

⑮ 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二一。

⑯ 同上書，頁五五～五六。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三九八～三九九。

⑰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七〇四。

一位帝大的教授出任商社性質的滿鐵理事，有辱學者顏面為由，百般刁難，後藤乃撰文駁斥，認為這是現今大學當局官僚性的言詞。他強調「學術唯因與實務一致而後才能高貴，制度唯因出於實務社會而後才有價值」⁷⁸。他所以力主「學俗接近」，目的是想藉殖民地的民事、商事等實際活動作為學術與實務一致的橋樑，而此目標的實現，是寄望於調查部。

滿洲舊慣調查班（調查部除設有舊慣調查班外，尚設有經濟調查班，主任為森茂，俄國調查班，主任為森御蔭）早期的成員除主任宮內季子外，尚有花岡伊之助、野村潔己、原邦造（以上皆為京都帝大畢業）、天海謙三郎、龜淵龍長（以上為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等五人。不久花岡、野村、原三人調至經濟調查班。一九一三年宮內離開滿鐵，由眇田熊右衛門（曾參與臺灣舊慣調查）接任，因此實際上參與此項工作者僅宮內、天海、龜淵、眇田等四人而已⁷⁹。

最初，滿洲的舊慣調查是把重點放在以奉天省為主的土地關係上，尤其特別重視與滿鐵的經營有關連的土地如收買鐵路用地及附屬地等問題。他們選擇調查的項目包括(一)不動產權——典、押、租等權利關係，(二)官有地、旗地等滿洲獨特的地目，(三)因漢人之移入而產生的新地目等，分別由宮內、天海、龜淵等三人擔任。由以上他們所擬定的調查項目，可知最初的舊慣調查，實際上僅止於土地慣行調查而未及於農村的其他方面調查。究其原因，係由於滿鐵創立當時，中國人羣起反對，咸認日本將以滿鐵為據點，擴大其勢力範圍，有併吞滿洲的野心，所以他們對於日本人的土地調查，非常敏感，皆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不太願意接受調查人員的訪問，在這種處境下，想仔細作農村慣行調查，實有其困難⁸⁰。

「滿洲舊慣調查報告」為調查部舊慣調查班的調查成果，共分九冊，計二、六六六頁，自一九一三年起至一九一五年逐一出版。茲將其內容、出版年月及執筆者列表如下：

(一)前篇

| | | |
|---------|---------|------|
| 一般民地（上） | 一九一四年二月 | 龜淵龍長 |
| 一般民地（中） | 一九一五年七月 | 龜淵龍長 |
| 一般民地（下） | 一九一五年七月 | 龜淵龍長 |

⁷⁸ 同上書，頁七〇六。

⁷⁹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四八〇。

⁸⁰ 同上書，頁四八二。

| | | |
|-------|---------|-------|
| 皇產 | 一九一四年二月 | 天海謙三郎 |
| 內務府官莊 | 一九一五年七月 | 天海謙三郎 |
| 蒙地 | 一九一四年二月 | 龜淵龍長 |

(二)後篇

| | | |
|------|---------|--------|
| 典之慣習 | 一九一三年二月 | 宮內季子 |
| 押之慣習 | 一九一三年七月 | 宮內季子 |
| 租權 | 一九一五年七月 | 眇田熊右衛門 |

調查部雖然一再強調「實地調查主義」，實際上，因受客觀因素限制，上列成果大部分還是參照固有文獻撰成的，其主要資料來源有(一)臺灣舊慣調查資料，(二)圖書資料如大清會典、盛京通志、理藩院則例、十朝聖訓、東華錄、東三省政略等，(三)日記、契據、判詞、諭摺彙存、政府官報、政府公報、各類新聞等，(四)實地調查時所蒐集的執照、契據等^①。

由上列調查成果可知早期的滿洲舊慣調查，僅止於土地關係，同時調查的區域也受到限制，就如同宮內季子在「典之慣習」的凡例中所言：「以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作為標題，恐有失當之處」^②。的確他們所完成的調查，只是滿洲舊慣的一小部分而已。

滿洲舊慣調查所以未能做到完美地步就此落幕，除上述受到客觀因素的限制外，還有調查班本身內部的原因；(一)自一九一七年以後，調查部的重心已轉移至經濟問題，重視舊慣調查的空氣，已逐漸衰微，(二)投注大半心血於舊慣調查的人員紛紛他就，如宮內於一九一三年前往臺中任職，天海於一九一八年轉入三菱公司，眇田調職至山東鐵路局，龜淵亦應聘於東洋拓殖公司。這些舊慣調查的大將們他就後，幾乎與舊慣調查工作絕了緣，以後雖然補充了新進人員，但他們的學識與經驗，實在較那些元老遜色甚多，形成後繼無人的狀態，當然就談不上有突破性的表現^③。

雖然如此，在中國的領土上實施舊慣調查，是為最初的一種嚐試，他們的調查成果雖侷限於土地關係上，但對於日後研究中國的社會及經濟方面，卻有開導先河之功，就以這點加以論斷，其價值應該是肯定的。

① 同上書，頁四八五～四八六。

② 滿洲舊慣調查報告——典之慣習，凡例，頁一。

③ 原覺天前引書，頁四九〇。

2.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在一九〇八年一月創設於滿鐵東京分社，倡議者為東洋史學專家白鳥庫吉。一九〇五年白鳥遊歷歐美時，看到歐美人士對亞洲問題研究水準之高及輝煌成績，使他很佩服並很感慨。不過他指出，雖然如此，滿洲及朝鮮因地處偏僻，歐美人士的研究尚未及此，而且該地已開放給日本學界，對於研究該地與日本國民在地理及文化上的關係，極為方便。他呼籲日本學者勿失良機，應致力於研究該地區之各種問題，以期對學術上有所貢獻⁸⁴。

白鳥在東京帝大山上御殿的一次聚會中，曾藉機強調研究亞洲問題是日本學術界對世界文化應負的使命，提議設立亞洲研究學會，該次聚會雖有七八十位關心亞洲問題的學者參加，但日本的學術界中醉心於歐洲問題者，形成一股很強的力量，此一提議並未受到學界廣大的重視。此後他不斷向政界及企業界請求資助，但總被認為這是學者的一種消遣工作，願望全部落空。一九〇六年滿鐵創立，後藤標榜「學俗接近」論，白鳥欣喜十分，造訪當時的文部省次官黑柳政太郎，並經黑柳向後藤轉達白鳥的意願，後藤有着獲得知己，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就這樣在後藤的大力支持下而誕生。

後藤極其欣賞白鳥計畫中的一段話：「日俄戰爭結束後，滿洲已歸滿鐵經營，而且朝鮮的開發與保護亦仰賴日本，日本人既負有如此重大使命，因此本人從學術的觀點一再強調研究滿鮮問題的重要性。蓋其意義有(一)基於經營滿韓的實際需要，(二)基於純粹的學術研究價值。因為現代的各種事業，應建立在堅實的學術基礎上，自不待言，經營滿韓，也是同樣的道理」⁸⁵。這與後藤的「文裝的武備」論與「學俗接近」論，不謀而合，後藤所以會大力贊助，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謂「滿洲歷史地理研究」，標題上使用了「歷史」與「地理」兩種不同的社會科學的名詞，因白鳥認為歷史的基礎在於地理，雖然他的重點在於歷史的分析，但是其地理環境不可不有所瞭解。他曾經主張「史的地理」，這是說明歷史的分析是離不開地理關係的，因為在敘述每一個時代時應將兩者加以統合運用⁸⁶。

在白鳥致後藤的報告書中，他提出了參與此項研究工作的人員與工作的分配，

⁸⁴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東京丸善株式會社，昭和十五年），序，頁四～五。

⁸⁵ 同上書，第一卷，序，頁一～二。

⁸⁶ 同上書，第一卷，序，頁六。原覺天，前引書，頁五〇一。

由報告書中也可以略為瞭解到他做學問的基本態度。書中稱：「地理的研究對象，以遼代以後為主，由松井等、箭內互、稻葉岩吉等三人擔任——松井等分擔遼金時代，箭內互為元代及明初，稻葉岩吉為明清兩代。首先在遼河流域即盛京省方面從事研究，如果將所探索的問題一一加以解決，相信可獲得很大的收穫。至於唐代以前的史料編纂，由池內宏及津田左右吉擔任——池內宏分擔編纂肅慎、扶餘、沃沮、獺狍、烏桓、鮮卑、靺鞨、渤海及與研究滿洲有密切關係而不可或缺的韓國史料如現存的最古史籍、三國史記等，並加以分析，闡明其歷史價值。津田左右吉分擔契丹、奚、室韋以及蒐集與研究滿洲文化史及種族志有關的資料」^⑦。

白鳥的研究方法是史料分析與實地調查同時並進，以這種方法運用於區域的研究，是一種創舉。就研究的過程而言，白鳥是將遼代以後的各朝代先作慎密的研究，然後即以這些研究成果及所蒐集到的唐代以前與滿洲民族有關的民族如肅慎、扶餘等的史料作基礎，再往上追溯，因此他又指派稻葉岩吉研究漢代，箭內互研究漢代及南北朝，松井等研究隋唐，使它形成一整合性而有系統的研究。經六年的研究，於一九一三年由滿鐵調查部出版「滿洲歷史地理」兩卷（上卷共四九五頁，下卷六八六頁）及「滿洲歷史地理附圖」一帙。同年十一月又出版「朝鮮歷史地理」二卷（上卷三六六頁，下卷三九四頁），一九一四年八月出版池內宏執筆的「文祿慶長之役」一冊（三六〇頁）。

「滿洲歷史地理」一書，是由白鳥、稻葉、箭內、松井等四人以朝代別及事件別而完成的研究成果。全書將漫長的歷史加以體系化，並依據共同的問題意識而完成的。雖然有人評該書為個人論文的集成，但是仍然不失為一種富有創見性的研究工作，不僅引起日本學者及中國人對滿鮮歷史地理的關切，同時也給予世界各國對該區域的研究帶動了刺激作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該書很受到重視，認為價值連城，滿鐵調查部乃應各界要求於一九四〇年由丸善圖書公司再版^⑧。

至於「朝鮮歷史地理」之研究，較前者短促，且參與研究工作者僅池內宏及津田左右吉二人（池內負責李朝時代，津田負責高麗朝以前），就以時限而言，僅限於高麗朝以前的研究，距具有體系的歷史地理書籍的理想尚有一段距離，如同白鳥在該書序文中所稱，主題尚有不盡完備之處，考證或有欠詳實，蓋因初次嘗試，缺少參考文獻，只能說是研究朝鮮歷史地理的開端。

^⑦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八六六。

^⑧ 原覺天，前引書，頁五〇五～五〇六。

一九一五年，滿鐵副總裁伊藤大八認為一個以營利為主的滿鐵，似無久設這種調查部門的必要，乃將之廢除。廢除後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即寄存於東京帝大文學部內。東京帝大文學部自一九一五年接收該調查部以後，即有學者不斷廣續前人的研究，至一九三四年為止，出版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達十三種之多⁸⁹。很具代表性的著作如池內宏的「滿鮮史研究」五冊（上世二冊，中世三冊，一九七九年由東京吉川弘文館再版），對學術界的貢獻很大。

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被廢除的消息傳出，後藤至為氣憤，表示：「廢除該調查部的歷史地理調查工作的滿鐵新幹部，其近視眼的行為，實在令人費解。這種歷史關係的調查，不僅能給研究世界殖民政策的學者帶來刺激，同時在治理實務上也可以產生很大的效果。日本在南滿不良措施的謠傳，也可以藉學者的力量，自然加以化解」，他又說：「在一年之中僅花上數千圓就可以推動的工作，就遽然加以廢除，實在令人惋惜」⁹⁰。當然滿鐵的高層幹部所以如此決定，也有其理由存在。時人以為調查部的功能僅以化解謠傳及誤解為目的，倒不如尋求更直接的調查比較實際⁹¹。新的滿鐵高層幹部雖然沒有否定後藤所標榜的「文裝的武備」及「學俗接近」的理論，但至少可以看出滿鐵的作風已漸有轉為更求實際的趨勢。

但是無論如何，由滿鮮歷史地理的研究，產生兩種不能否認的結果，那就是（一）建立了研究中國史尤其是邊疆史的基礎，（二）培養了不少史學家，如箭內互、池內宏、和田清（東京帝大教授）、稻葉岩吉、瀨野馬熊（朝鮮史編修官）、津田左右吉（早稻田大學教授）、松井等（國學院大學教授）等皆為享譽學術界的史學家⁹²。

3. 東亞經濟調查局

東亞經濟調查局於一九〇八年九月創設於滿鐵東京分社，為後藤新平所標榜的「文裝的武備」論下所設立的一連串調查研究機關之一。該局尚未正式成立前，後藤雖已轉任第二次桂太郎內閣之遞信大臣（一九〇八年七月），但該局為後藤一手籌劃而成。早在臺灣民政長官時代，他即已孕育了這個構想。一九〇二年當他訪問巴黎里昂信託銀行（Crédit Lyonnais）時，發現該銀行附設的調查局對於日本的公

⁸⁹ 同上書，頁五〇七。

⁹⁰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八六八。

⁹¹ 安藤彥太郎、山田豪一，「近代中國研究と滿鐵調查部」，頁三九（歷史學研究，第二七〇號，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⁹² 原覺天前引書，頁五〇七～五〇八。

債、經濟、企業等各方面瞭如指掌，有關日本的事情，整理得井然有序，像字典一樣，立刻就可以查出來^⑨，使後藤甚為吃驚與佩服。此次法國之遊，使後藤對設置經濟調查局的構想更趨成熟。及至後藤由臺灣轉至滿洲（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即延攬京都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為滿鐵理事兼司籌設調查機關事宜，並於一九〇七年七月派岡松前往歐洲為籌設東亞經濟調查局而作實地考察，藉此吸取科學的調查方法及物色輔佐人材。

在此之前，雖已在大連與東京分別設立了調查部與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但其調查範圍僅及於中國及滿蒙的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方面，如果想掌握世界商情則必須另設機關來負責。後藤認為在瞬息萬變的世界情勢中，調查工作不可以僅侷限於滿洲問題，應擴大視野，不時注意與滿洲有關的世界局勢，而且研究方法必須近代化，情報資料的蒐集範圍應擴大到世界各國，資料的整理也應力求科學化。依據東亞經濟調查局的記載，該局的目標有三：

(一)多參加世界性的經濟活動，因為新興的日本及滿蒙將來的發展，視參加世界性的經濟活動的多寡而決定，如果忽略世界經濟情勢，則對日本及滿蒙的經濟發展將產生不良影響。

(二)蒐集整理世界各國的經濟資料，尤其應以東亞各國的經濟資料為基礎，建立日本及滿蒙的經濟立腳點。至於整理的資料及調查成果盡量開放給一般社會人士利用。

(三)建立學術研究的基礎，培養層次較高的調查研究人材^⑩。

後藤曾說殖民政策是一種霸術，因此該局所負的任務一方面藉所蒐集的世界經濟情報，正確掌握各國在東亞地區的動態，一方面緩和列強對日益膨脹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所施的壓力。因為該局的功能既可以與外國銀行與企業界之間交換商情及研究成果，如果各國對日本在滿洲的政策有質疑之處，該局也可以加以解釋。換言之，該局實際上負有向各國掩飾日本的殖民真面目的任務，同時也具有「滿鐵之外務省」的性格，為滿鐵對外的發言機關。至於該局的工作內容，由下面一段記載中窺知其一斑。

「東亞經濟調查局係仿倣德法著名的銀行、公司所設置的調查局或檔案局，與海內外官署、著名的經濟機關及大企業機關氣脈相通，接受他們提供的各

^⑨ 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八五五。

^⑩ 東亞經濟調查局概況（東京東亞經濟調查局，一九二一年），頁一～二。

種報告及資料，並經常蒐集各國新聞、雜誌、書刊等加以有系統的分類整理。依資料的性質分類爲(一)本局事務及其他經濟調查所，(二)鐵路，(三)旅行、旅館及其他，(四)航海、港灣、運河、河川，(五)鑛山、煤炭，(六)工業及農業，(七)財政及國債、地方債，(八)銀行，(九)殖民、土地、移民，(十)勞工問題、勞工保護制度及有關鑛山勞工的保護制度，(十一)一般經濟及外國貿易，(十二)東亞經濟等十二項，再從十二項中依國別加以細分，細分後又依其性質再加以分類，然後予以收藏，供隨時調用。本局所蒐集有關東亞經濟狀態的資料，原則上提供給與本局有來往之海內外各國經濟機關。除此，本局也接受各官署、公司及其他機關委託，從事各種調查，並答覆外國的質詢。本局不僅只限於蒐集資料，有時也發表有關經濟問題的調查報告，尤其重要的是本局將東亞之國情及商情隨時介紹給外國，疏通彼此意見，以防外國的誤解」^⑤。

以上記載顯示東亞經濟調查局的工作，分成兩部分，(一)爲蒐集及整理世界商情，尤其特別重視東亞地區，並與世界各經濟機關交換資料，(二)爲從事經濟的調查研究與分析。尤其前者爲該局的工作重點，所以有人評早期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爲一種資料館。

東亞經濟調查局成立之初，表面上是由岡松參太郎主持，但實際上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發生這一段期間，主宰該局工作者爲以德國人爲主的外國顧問。德國但澤高等工業學校教授休士(K. Chies)在該局成立時，即應聘前來該局工作。後藤在臺灣民政長官任內，曾閱讀休士發表的有關經濟論文，大爲讚賞，因休士的論文替後藤解決了一直困惑著他的資料編目問題。該局的資料編目係採自休士所用英文二十六個字母加上阿拉伯數字的方式。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擔任該局局長的松岡均平很自負地說：「調查局內的任何資料，在五分鐘內一定可以查出來」^⑥，而引進這個編目體系的功臣就是休士。的確，東亞經濟調查局的基礎，是在岡松參太郎與休士兩人的悉心籌劃與指導下而建立的。繼休士之後(一九一一年)應聘前來者爲德國內務省參事官維德非爾，他是一位社會保險問題專家^⑦。維德非爾於一九一三年返國後又聘請德國曼海姆高等商業學校教授貝倫德前來。該局除聘請上舉外國的高級顧問外，同時也聘請奧地利等國的助理，協助推動整理資料事宜。當時

⑤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十年史，頁九〇六～九〇七。

⑥ 草柳大藏，前引書(上)，頁八三。

⑦ 休士日後曾出任德國外長，維德非爾返國後出任德國最大鋼鐵公司的社長。

德語幾成爲局內的常用語，而日本籍局員的德語程度都很不錯。

以高薪禮聘外籍顧問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要借重他們的才識與經驗，另一方面則有對外宣傳之意。該局第二任局長松岡均平曾經很直率地說：「日本經營滿洲，難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猜忌，如果被外國認爲日本在搞利己主義的勾當，對滿洲的經營將產生障礙，爲消除這個障礙，與其由日本人出面解釋，不如透過外國人來表明，效果來得大」。這是運用心理作用的策略。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外國顧問紛紛返國，局務完全由局長松岡均平主持，此時該局已有相當的組織化，並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因爲曾有不少歐洲顧問任職於此，該局在海外的名氣遠較日本國內爲大⁹⁸。

該局自創設以來即積極蒐集世界各地的圖書、雜誌、新聞等，爲數甚多，尤其有關東亞地區的資料，堪稱爲世界之冠。由這些資料而作成的報告達一百篇以上，其他以小冊子或叢書方式出版者不計其數⁹⁹。尤其由該局出版的「經濟資料」（自一九一六年起爲月刊）及滿鐵調查部出版的「滿鐵統計年報」（一九〇九年創刊）與「調查資料」（自一九一八年起爲月刊），同爲當時日本各大學的研究室必購之書，而且購買數量都以百冊爲單位，不難看出受到學術界重視的情形。該局自一九二八年起又出版一種定期刊物，名爲「東亞」，爲該局人員發表調查成果的園地，同樣受到各界的重視。

東亞經濟調查局的設立目的一如前述(一)爲蒐集資料，(二)爲對社會的貢獻，(三)爲網羅人材，該局確實做到了某種程度的成功，然而奇怪的是該局自一九〇七年創設至一九一九年爲止，並未制定任何組織法規，其隸屬關係有時直屬副總裁，有時又受總務部庶務課的監督，有時由理事長室直轄，直至一九一九年九月間，滿鐵當局爲統一調查課(滿鐵調查部的後身)與東亞經濟調查局之間的事業，令兩者皆歸東亞經濟調查局長松岡均平指揮，此舉只是不成文的規定，依然沒法令依據。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始制定「東亞經濟調查局事務分掌規程」，設資料及編輯兩課，該局才正式有組織條文。在這十一年期間，主持者與局內同仁之間各司專責，並沒有受到條文約束，當時他們也許認爲沒有組織與規程較爲自然。不可否認，該局是當時羣

⁹⁸ 山田豪一，滿鐵調查部——榮光と挫折の四十年，頁四三。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八五八～八五九。

⁹⁹ 德國法蘭克福的報紙對東亞經濟調查局創設的經過及聘請休士的情形有很大篇幅的報導。見鶴見祐輔，前引書，第二卷，頁八五六～八五七。

¹⁰⁰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二四二七～二四二八。

英聚集的地方，爲自己的理想及工作都能全力以赴^⑩。

一九二七年七月，山本條太郎就任滿鐵總裁（一九二九年八月卸職），他經營滿鐵採取「經濟化」與「實業化」，並確實執行，並把滿鐵視爲一個營利公司來經營，盡量節省開支，因此，即使一九二九年發生經濟大恐慌，滿鐵收入並未減少，反而有百分之八的增加^⑪，山本被譽爲「滿鐵中興的偉材」。山本鑑於世界的局勢與中日滿的關係，認爲如果日本想在東亞地區加強經濟活動，必須要充實國家的調查活動，並且應將東亞經濟調查局提升爲屬於國家的調查機關（原屬滿鐵），充裕其資金，擴充其內容，盡量使其發揮功能，主張將該局脫離滿鐵而獨立^⑫。一九二九年八月，該局終於脫離滿鐵而獨立，名爲財團法人東亞經濟調查局。

東亞經濟調查局雖然獨立，事實上並沒有完全與滿鐵脫離關係，因爲在「財團法人東亞經濟調查局寄附行爲」第十二條中規定，該局設會長一人，理事五人至十人，監事三人以上，評議員若干人。會長一職由山本條太郎擔任，理事長爲大川周明，常務理事爲佐藤貞次郎、理事及監事有大淵三樹（滿鐵東京分社長）、伊藤武雄（滿鐵總社調查課長）、橋本成子郎（滿鐵東京分社經理課長）等人^⑬，可知該局的高層幹部幾乎都是「滿鐵人」，而且該局的大部分基金又出自滿鐵，實質上該局仍然受到滿鐵的指揮與影響。獨立後的東亞經濟調查局，擴大編制，設庶務、調查、資料、編輯等四部，執該局牛耳者爲大川周明，自此進入大川周明的領導時代。在大川領導下的東亞經濟調查局的作風有很大的改變，除繼續作亞洲地區的調查外，着重於純學術性的研究，成績輝煌。

東亞經濟調查局所蒐集的資料與調查成果，除提供給日本經濟學界寶貴的資料外，也因它的茁壯成長，自一九一四年以後給日本企業界帶來蓬勃的機運，促進了經濟調查機關的發展。然而因經濟調查機關紛紛設立的結果，導致彼此缺少連絡弊病，因此，一九二〇年二月間乃有聯合全日本的調查機關共同組織一個大團體之議。同年五月，東亞經濟調查局、大藏省理財局臨時調查課、農商務省文書課、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經濟統計研究室、日本銀行調查局、住友總社經理課、山下輪船公司調查課、神戶高等商業學校商業研究所調查部等八機關代表於學士會館召開發起代表大會，討論有關創立事宜，十月，在帝國鐵道協會正式成立連合總會，並

⑩ 草柳大藏，前引書（上），頁八九。

⑪ 原覺天，前引書，頁四四二。

⑫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二四二九。

⑬ 原覺天，前引書，頁四四三。

決定以東亞經濟調查局爲理事長機關（即該局局長爲會長），日本銀行調查局爲副理事長機關，設連合會辦事處於東亞經濟調查局內，推動各種會務。連合會設立之初，參加的大小調查機關有五十四個，並有逐年增加之勢^⑭。事實上，這個連合機關的主角是由東亞經濟調查局扮演。前日本銀行調查局長吉野俊彥稱：「照常理而言，日本銀行調查局長的社會地位最崇高，但自連合會成立至戰爭結束（二次大戰），會長的椅子一直由滿鐵東京支社的一個局長所獨占」^⑮，足以證明東亞經濟調查局係因最早吸取近代化的資料蒐集與整理方法，才能穩固地站在領導的地位上，而這份榮耀則係後藤新平的遠見以及當初參與籌劃的岡松參太郎、松岡均平等辛勤耕耘的結果。

六、結 論

滿鐵是日本實行其殖民政策而在滿洲設立的代理機關，它的表面雖然披著一層公司組織的幌子，但是它的骨架卻是伸張日本勢力於大陸的大本營。像這種負有特殊使命的機關，配置了一位有殖民經驗的後藤新平出任總裁，在當時應該說是決策當局的最佳安排。

世人評後藤爲科學的政治家，的確，他無論位居何種職務，都主張以科學的方法處理事務，尤其他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將近九年的任內（一八九八、三～一九〇六、十一），一直秉持這一原則，政績斐然，被譽爲成功的殖民政治家，爲日本層峯所賞識。他經營滿鐵的措施，有很多是他治臺的翻版，換言之，他殖民滿洲的理論，是治臺實績的延伸，所不同的是當時臺灣已割讓給日本，爲日本領土的一部分，環境單純，又有總督兒玉源太郎大力鼎助，可以順利推動其政治理想。反觀滿洲是中國的領土，卻在列強環伺之下，尤其是俄國雖然戰敗，威脅依然存在。後藤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所標榜的「文裝的武備」是爲因應當時這種客觀的國際情勢下所提出的殖民理論。

就如後藤所說「文裝的武備」是揭王道之名以行霸術之實，也就是等於間接的侵略，他在滿洲的措施，都在配合著這種理論，經營滿鐵，雖然阻力重重，但是很多問題，都在這種理論下迎刃而解。

^⑭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三次十年史，頁二四二九。

^⑮ 草柳大藏，前引書（上），頁八六～八七。

雖然如此，他的理想也並不如預期的那麼圓滿，畢竟滿洲的環境是複雜的。例如他曾經想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模式經營滿鐵，但滿洲一直存在著「三頭政治」，滿鐵既不能獨當一面，也處處受到其他兩個機關的掣肘，相形之下，滿鐵的權限就遠不如東印度公司。

後藤又極力主張移民到滿洲，藉此扶植日本在滿洲的政治及經濟勢力，期使滿洲成爲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然而當時無論是日本政府或滿鐵當局對移民問題——尤其是農墾移民，始終沒有積極的措施。相反地，中國已經警覺到滿洲的岌岌可危，以開放政策來抗拒日本的侵略，華北則因自然、社會、地理等條件與滿洲相似，因此該地人民大量流入滿洲，滿洲的社會基礎，事實上仍然建立於中國人身上。站在經濟的觀點來看，開發滿洲，一面需獎勵移民，一面須作巨額的投資，這在早期的滿鐵而言，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華北移民的流入，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倒使日本的移民政策轉趨消極。日本經營滿洲將近四十年，移民未盡理想，未能澈底控制滿洲，後藤的理論功虧一簣。當然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失敗，是其帝國主義未能實現的根本原因。吾人因觀歷史，則不能不對後藤的見解佩服和恐懼。

至於調查事業方面，因爲滿鐵並不是單純的營利公司而負有特殊使命，因此其調查機關的任務也與一般營利公司的調查機關有異，它的調查事業是多元化的。滿鐵的調查機關分設各地，不相統屬，顯得很雜亂。滿鐵也承認「滿鐵的調查事業，各行其事，公司內的調查機關並無一定的統制組織，使人有頭緒紛繁之感」^⑩。後藤所倡設的調查機關，因他的調職而發生變化；首先滿鐵調查部於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降格爲調查課（隸屬於總務部），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於一九一四年被廢除，東亞經濟調查局又於一九二九年八月脫離滿鐵而獨立，這一連串的變化並不是抹殺後藤重視調查事業的價值，而係基於滿鐵經營的轉移與組織的改編，當然藉改編組織而緊縮經費是爲最重要的因素。

無論如何，調查機關的人員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的調查與研究成果是輝煌的。根據楊覺勇（John young）的研究，自調查機關的設立至二次大戰結束，在這將近四十年期間，他們所提出的研究報告達六千六百件，爲研究之用而剪貼的資料、書籍、雜誌、新聞等共計有五萬件之多，他認爲這個成果堪稱爲二十世紀亞洲的一大知識寶庫，而這個知識寶庫卻在後藤手中奠定基礎的。

總之，後藤的殖民理論，完全是爲日本伸張勢力著想，是富有帝國主義思想

^⑩ 滿鐵總務部資料課編，昭和十年度滿鐵調查機關要覽（東京龍溪書舍，一九七九年），序，頁一。

的。暫且不論其功過如何，由於他強調調查事業的重要性，才能有為數可觀的遺產——調查研究的成果留給後人，提供了研究近代中國及亞洲地區的社會、經濟、農村、政治等問題的學者極為寶貴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卻是無數調查人員的心血所累積的結晶，中國的一草一木盡在日本的掌握中。